

馮蘭瑞

說明：這是一篇回憶錄，是上世紀七八 年代之交一個學術討論的歷史記實。因為是寫歷史，必須忠於事實。無論對何人何事均不作掩飾，不為尊者、賢者諱，當然也不會去誇大任何人的缺點和問題。一切如實寫來，不免要涉及一些人，也是有名有姓，不用某某代替。所有內容均有事實可考，或報刊書籍，或本人的原始筆記。如有同志發現錯誤及不準確之處，望能給予指正。此類文章，可能無緣付梓，亦無所憾。能做到為這段經濟學學術思想史留下一個真實的文本，余願足矣。此文主要根據的是當年報刊文章、筆者當時的工作筆記和會上自己的原始記錄。文中涉及的以前知道得不太清楚的個別重要情況，為了說清楚，參考、引用了近年幾位同志的回憶錄和有關著作。謹在此表示感謝。

近年看到幾位同志的回憶文章，有的說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因受到嚴重干擾而夭折了，甚為惋惜。胡績偉回憶說¹：

胡耀邦同志針對多年來工業建設中的嚴重偏向，抓住「我們生產的目的是甚麼」的核心問題，策劃和組織了文章，指導《人民日報》帶頭開展了一場「生產目的」的討論。可惜受到了保守、傳統勢力的嚴重干擾，半途而廢，沒有發揮到預期的作用。

李洪林說²：

1979年曾經有一次重振思想解放運動勢頭的機會，可惜在胡喬木的扼殺之下中途夭折了。這次機會就是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

他們兩位說的情況都是實情，可只說到《人民日報》當時的情況。之所以如此，大概由於「暫停討論」這一擊留下的印象過深之故吧。另外也有的同志根據自己所知的一個側面，對這場討論作了不全符合事實、不全面的敘述。

作為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我曾參加1979年至1980年的這場生產目的的討論。據我所知，《人民日報》暫停討論，僅僅使該報的討論中斷了一個時期。全國各地無論報刊文章還是學術活動，生產目的的討論沒有停止，還舉行了一次全國性討論會，討論並未夭折。

事過二 幾年之後，看了一些回憶錄，對當時一些有關細節的了解很有幫助；也才知道有些關心的同志不全清楚當時的情況，為它的夭折而歎息；也有的回憶文章存在著與當年實情不全相符之處。有鑑於此，我認為應該採取對歷史負責的科學態度，將我親歷的情況如實記載下來，告慰關心這場討論的同志。更重要的是，還歷史一個完全真實的面目，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誤傳，也方便今後對那一段經濟思想史有興趣的同志開展研究工作。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三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由於「四人幫」垮台和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方針的極大鼓舞，首都經濟學界十分活躍，奮起批判「四人幫」，積極參與撥亂反正，發表了許多文章，開展了不少學術活動。

（1）按勞分配理論討論，「兩個凡是」初次突破

早在1977年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的時候，首都經濟學界就率先突破「兩個凡是」的限制，公然違反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說的：「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偉大理論指示」³，發起了持續兩年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最後召開了規模不小的全國性討論會。這場討論系統地批駁了「四人幫」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產生新資產階級的謬論，維護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這是二五年前我國經濟學界在「文革」結束後的一次創舉，贏得了「經濟（學）繁榮」的美譽。

這場討論首次舉行會議的時間，選擇在1977年2月7日《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發表、「兩個凡是」甚囂塵上的時候，是需要有點勇氣的。當時中央布置全黨學習黨報社論，抓綱治國。而我們看到的國情是，十年浩劫使國家經濟破敗、人民在饑餓線上掙扎。「文革」期間社會主義基本理論被攪得一片混亂，而以與人民生活密切關聯的分配理論為最。按勞分配理論備受「四人幫」歪曲詆毀，自1974年以來被攪得混亂不堪。實踐中更是實行「平均主義」（實際上是「平均」掩蓋少數人對勞動者進行超經濟剝削而過貴族式的生活），廢除物質利益原則，取消計件工資和獎金，用搞政治運動、打仗的辦法搞生產，甚麼「大會戰」、甚麼「大幹、快幹、苦幹、巧幹」等等，「四人幫」控制的上海還出了個「23幹」的笑話；武漢鐵路局的職工則說：「活著幹、死了算」。勞動者的情緒低沉到了極點。「文革」期間農業也遭受嚴重破壞，農產品供應緊張，市場一片蕭條。

「十年教訓」不尋常！經濟學同仁痛感不批判「四人幫」詆毀按勞分配的謬論，不弄清甚麼是資產階級法權，不在分配問題上撥亂反正，實行物質利益原則，就不可能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恢復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

1977年初，國務院政研室領導人之一、經濟學家于光遠一倡導，大家就行動起來。重溫馬克思的分配理論、找材料、編資料、交換意見、寫文章發表。這時，由于光遠組織、我也有參加的按勞分配研究小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月下旬，舉行按勞分配討論會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

於是，北京經濟學界率先解放思想，頂風破浪，於1977年2月25日召開了北京地區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接著又於同年4月、6月和第二年10月連續舉行了三次全國性的討論會。也就是說，1977到1978年這兩年，就舉行了四次全國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

在召開第一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的同時，又開展了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於2-3月份開了幾次「對批判的批判」學術座談會。在會上，于光遠說：「我就是唯生產力論者。」在發表了一些文章之後，于光遠與林子力等經濟學家合作研究，於1978年4月出版了一部著作《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人民出版社和廣東人民出版社同時出版）。

1977年按勞分配理論討論和唯生產力論的討論，是我國理論界對「兩個凡是」的第一次突破，為以後的解放思想和一系列學術討論，包括真理標準的討論拉開了序幕。這些學術活動活躍了思想，促進了理論研究，對實際經濟工作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2）思想解放的高峰——理論工作務虛會

上世紀下半葉，對我國思想理論前進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是，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簡稱務虛會）。這個會議使思想解放達到高峰，是突破「兩個凡是」禁區的轉捩點。

會議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兩段開。春節前第一段，北京地區理論戰線的同志被邀請參加，從1月18日開始到2月16日。春節期間休會。節後會議擴大到各省市和軍隊派來的同志，最後請中央領導同志講話（春節後因為等待中央同志講話將會議延遲幾天）。第二段於3月28日開到4月3日。兩段一共開了37天。

第一段會議開得很緊湊、很活躍，休會前思想解放達到高潮。我作為與會的一員，確實感受到一種徹底解放思想的振奮。雖然會議第二階段精神有些變化，但從全過程看，我和絕大多數與會同志一樣，對這次理論務虛會的功績和重大歷史意義是沒有絲毫懷疑的。

1979年1月19日，北京地區一百多位理論工作者精神振奮地來到京西賓館。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由中央召集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大禮堂嚴肅開幕。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首先在大會上講話。他甩開事先準備的稿子，即席講了篇「引言」，內容包含三個部分：大會的由來、目的和開法；對兩年來思想理論戰線形勢的估計；偉大的轉變和理論宣傳的任務。

講話中，他對兩年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作了充分的肯定，給予思想理論戰線隊伍的同志以高度的評價。他在列舉揭批「四人幫」謬論的事例時，沒有忽略經濟學界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和詆毀按勞分配理論的批判。他高度讚揚思想理論工作者、理論宣傳者為突破「四人幫」設置的各種禁區作出的貢獻。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線的前衛戰士」。

接下來，胡耀邦號召大家要認真總結經驗。他說，幾年、幾年、幾年的經驗都有必要總結。我們理論宣傳和理論研究，有一些好的經驗，也有不好的經驗，都要總結。在談到批評和自我批評時說，對犯過錯誤的同志，絕不要輕易把人家打倒。他例舉了「毛澤東對彭德懷講的一段話。那是在1965年底，彭德懷分配到三線當副總指揮，毛主席請彭老總吃飯，對彭老總講了三句話：『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這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會時浦安修講的。」胡耀邦說，我相信毛澤東同志是這樣講過的。他老人家在經過一個時期後總要回過來想一些問題。

胡耀邦在談到「文革」問題時，又講了毛澤東說的一段話。他說這話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屆二中全會上他親自聽見的。那天下午一點鐘，毛澤東講了幾句話後，問：「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下面鴉雀無聲，沒有答覆。毛主席接著說：「我看五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是我們這一段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胡耀邦說：「我聽了這句話後，一夜沒有睡著。」⁴

對於當前宣傳工作、理論工作的任務，他談了三點：第一、一定要認真讀馬列和毛澤東著

作。第二、一定要認真面向實際。第三、一定要解放思想，帶頭搞好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優良學風。他強調說：「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發揚理論民主。」有史以來，中宣部長對思想、理論工作者講這樣的話，可能還是第一次。我和大家一樣很受鼓舞。我在小組發言中，只對關於民主個人主義那個提法不同意。同組的邢方群碰到胡耀邦時對他說了。

不久，又傳來鄧小平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聽了小平的指示、耀邦的講話，與會同志無不感到心情舒暢，精神興奮。按照他們講話的精神，不僅「文革」的問題可以議論，毛澤東的問題也可以議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破天荒的一次思想解放。與會同志大都敢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這次務虛會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都進行深入討論，並有若干新的突破。整個會議充滿了一種新鮮氣氛。小組討論會上，對一些有分歧的問題，各種不同的意見都擺到桌面上，實事求是地、面對面地進行討論、互相辯析。與會的絕大多數同志對這一段會議是非常滿意的。

春節休會前，會議領導小組曾計劃復會後進行大會討論。在2月25日的小組會上，本組召集人童大林傳達領導小組意見，休會期間大家要積極準備發言。我們小組聽了傳達，情緒高漲，提出一個問題分工分頭研究，要寫出發言稿或提綱，準備作系統的大會發言。

（3）會議枉遭蜚短流長、思想解放難避坎坷

這次空前的思想解放大會，在1979年初「兩個凡是」尚未被突破，阻力還很強大的形勢下召開，表明黨中央宣傳部堅持貫徹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的決心和氣魄；同時也不可能不受保守勢力的干擾。在會議第一階段，就有人弄了一些外地材料印發會議參考，反映一些地方群眾鬧事；還有一些對務虛會的流言蜚語，如說甚麼解放思想過了頭、引起思想混亂，等等。還有人直接寫信給大會進行干擾，例如：我們小組的最後一次會上，念了一封毛選編輯室張誠寫的信，念完後讓大家議論。吳冷西說，這封信從2月6日就已經寫好，經過賈步兵、熊復、胡繩等共二人看過、修改。還說，支部討論過。不過我沒有記下是哪個支部。林潤青評論說，張誠的信堅持「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情緒躍然紙上。

這些干擾給解放思想、突破「兩個凡是」之後轉為思想控制做下伏筆。春節後於3月28日復會。孰料會議精神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前一段與會的北京同志改住國務院第一招待所，京西賓館騰給後來的同志。北京與外地同志不住在一起，各自分別編組、分別開會，不便接觸和交流，並取消了大會討論。我們準備的發言稿都作廢了。3月30日鄧小平在大會上作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4月3日胡耀邦在最後一次大會上作「結束語」。他說：「前一段，同意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講話開始時講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三中全會後召開了，大家敞開思想，提出了不少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後一段，經過小平講話，我看開得相當完滿了。」「小平同志對我們有點批評性的意見，不如說是勉勵性的意見。」「最後，向理論界提出要求：一要接觸實際，用各種辦法包括下去調查，看材料，找人談話。二要很好振作精神，更大的振作，鼓起勇氣。不要因為我們有些缺點、不足，心有餘悸又來了。不會打棍子、戴帽子、抓辮子了。不要聽吹風，現在風多得很。要敢想敢幹、」（摘自馮蘭瑞的大會原始記錄。）

令人困惑的是，務虛會閉幕後不久，中宣部就一再發出通知，令所有與會同志將全部會議簡

報交回。大家都不願意交。於是除通知個人外，又通知支部負責收回。那時我還在中辦研究室（當時我是隨同國務院研究室合併過來的），是個支書。由於大家都不想交，我也不積極。此事拖到年底，我請調批准到馬列所。臨走前，我將收回的幾份連同我自己的一份會議簡報交給後任陳進玉，囑他在收齊後送中宣部。此事當時感到困惑，事後才明白其中大有文章哩。

務虛會後不久，7月初就發生了「階段風波」。兩位理論權威給我同蘇紹智合作的文章《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扣上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帽子，召開秘密會議布置《經濟研究》組織文章同我們商榷，而且不許登反批評的文章，內部刊物也不許登。消息不脛而走，傳遍全國各大城市，學術界大為震驚。思想解放運動形勢風雲突變，還有誰敢說話？

二 生產目的討論 起始、集中、干擾、繼續

1979-1980年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這場討論，是在一屆三中全會的影響下發起進行的。全會公報明確指出：

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儘管四項基本原則為思想理論工作劃定了嚴格的界線，但是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的宗旨是不變的。如何才能發展生產力？這就要求我們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生產是為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的和文化的需要。這個問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習研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時就討論過。1970年代末期，「文革」結束已三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局面沒有扭轉，人民生活極度貧困。1978年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號召從1979年起全黨工作重點要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為此，首先就要恢復被嚴重破壞的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勞動者的生活。這是上世紀七八年代之交發動生產目的討論的直接原因。

當時領導層對於如何發展生產力，存在不同的指導思想和做法。較有頭腦的人都看到，中國正在開始一個新的脫離國情的「大躍進」。有的領導人強調「大幹快上」，強調發展重工業，大規模搞基本建設，繼續實行以鋼為綱，要建一個大慶，一個開樂，三個電站，引進二二項工程，而忽視農業、輕工業的發展，忽視人民生活的改善。

正是針對這種情況，1978年前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曾組織調研組到幾個省，對農民、職工的生活狀況作實地考察，分別寫出了調查報告，向中央彙報，還印了《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反映職工生活困苦的情況。這個問題不僅引起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經濟工作者的注意，更為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所關心。如果不千方百計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發揮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如何能夠恢復經濟？又如何實現現代化？

實踐再次將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認清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擺到了經濟理論工作者面前，他們在報刊上展開了討論，發表了許多文章。以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重要文章進行了集中的討論，不料因受干擾而暫停。但是各地分散的討論仍在繼續，最後首都經濟學界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生產目的討論會。

1979-1980年，我有幸參加了這場生產目的的討論，參與1980年12月全國性討論會的醞釀、籌備和組織工作的全過程。

這場討論的過程可分為三段：一、1978年下半年，生產目的的討論開始；二、《人民日報》的討論從集中到暫停；三、全國性討論會的準備和舉行。關於全國性大會，這部分只寫到準備的過程，其餘情況擬放在第三部分去寫。

（1）1978年下半年，生產目的的討論開始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生產目的的討論，從手邊的資料看出，五六十年代已進行過兩次討論，第二次到1963年5月，以後就停頓了。1978年下半年，又見到報刊上有零星的文章。1978年12月2日《解放日報》刊登了蔣家俊的〈甚麼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怎樣理解斯大林對這個規律的表述？〉一文。接著，1979年初，又有《學術月報》、《群眾》、《學術論壇》等報刊刊登漆琪生、李彥、徐禾等人討論基本經濟規律問題的文章。其中1979年1月22日吳世泰等在《四川日報》上直接提出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甚麼？〉的問題。1月26日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鄭日安在《財貿戰線》（《經濟日報》前身）發表題為〈現代化首先要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一文。

根據手邊不完全的統計，1979年1-12月全國報刊上刊登的討論社會主義基本規律的文章有160多篇。其中，題目標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約90篇。首都和各地報刊如《財貿戰線》、《經濟研究》、《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山西日報》、《青海日報》、《內蒙古日報》、《新華日報》、《廣州日報》、《學術月報》、《文匯報》、《吉林日報》、《黑龍江日報》、《南方日報》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學報等等不下數百家報刊，發表了百餘篇討論生產目的的文章。作者大部分是經濟理論戰線上的工作者，討論的內容廣泛涉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理論上也有一定的深度。（資料來源：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學術資料室唐宗焜主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報刊文章目錄索引（1949-1979）》。）此外，還有一些地區、大學召開座談會和討論會。

與此同時，國務院務虛會上已經提出過生產目的的問題。國務院政研室領導人之一的于光遠參加了這次務虛會。在1979年9月一次北京地區經濟學座談會上，于光遠說，生產目的的討論的醞釀過程始於1978年。早在1978年的國務院務虛會上，就有同志提出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過當時談論較多的是價值規律，我（于光遠）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問題。第二次是一屆四中全會前後，中央提出新的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頓、提高。調整經濟結構要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明確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現在，第三次提出這個問題，主要在於總結三十年的歷史經驗，特別是近三年多的經驗。（錄自馮蘭瑞當時的會議原始筆記。）

如前所述，上世紀七八年代之交，我國報刊上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並非始於1979年第三季度。這是有資料可以查證的。

（2）《人民日報》上的討論從集中到暫停

1979年第三季度，首都報刊集中地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始於于光遠談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問題一文和《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相繼發表。

1979年9月11日，于光遠先在《財貿戰線》發表了這篇談生產目的理論的文章（此文並刊於《經濟研究》1979年第11期），10月2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題為「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的評論。10月22日《人民日報》又轉載了上述于光遠9月11日的文章。12月31日《人民日報》再刊登了任仲夷12月6日在遼寧省委召開的生產目的討論會上的發言：「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如此集中地發表重要言論，自然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全國各地報刊紛紛發表文章，集中的討論正待展開。

本來生產目的問題從上年七八月就已在全國各地報刊上討論，但因比較分散，未引起重視。現在，具有權威性的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集中地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並轉載了于光遠、任仲夷的文章，情況就不同了。

《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這篇重要評論開宗明義：我們「為甚麼要發展生產？」、「社會主義制度下怎樣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等等，提出了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闡明解決這個問題對於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加快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性。指出「不能為生產而生產」，對為生產而生產的種種表現作了深刻的分析批評。最後在總結經驗教訓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首先是沒有處理好生產與消費的關係，重生產，輕消費。評論批評了我國經濟工作中長期以來片面理解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錯誤地認為可以脫離消費資料的生產而獨立地發展生產資料，重工業自我服務過多，為農業、輕工業和人民生活服務不夠，等等。評論還批評了「盲目追求高指標」的錯誤。

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和于光遠、任仲夷等的重要文章的發表，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強烈反響。一方面，受到廣大經濟工作者和經濟學者的歡迎；另一方面，由於觸犯了維護計劃經濟的一些人的意願而遭受反對甚至干擾。

經濟學工作者發表不少文章支持《人民日報》，指出：如果不明確認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仍舊為生產而生產，為實現領導意圖而生產，為完成計劃而生產，不僅造成資源和資金的浪費，生產上不去，經濟恢復不可能，而且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經濟要恢復，社會要發展，必須從更基本的方面入手，端正生產的指導思想，明確生產的目的，確立為滿足人的需要而生產的觀念，實現基本經濟規律，改善人民生活。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增加生產；生產增長了，反過來又為改善人民生活創造條件，形成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生產之間的良性迴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現代化宏偉目標。

另一方面，《人民日報》上集中發表討論生產目的的文章也遭到一些報刊文章的反對，主要是石油部門的報刊：《石油工業簡報》、《大慶戰報》、《華北石油報》，他們指責這些文章對「先生產、後生活」的批評，還點了于光遠的名。其實于光遠在他的「談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問題」一文中對「先生產、後生活」、「先治坡、後治窩」的批評還是很溫和的。他僅僅是在文章的最後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說要研究「在甚麼樣條件下來說是可以的，對甚麼來說就是不正確的？」（《經濟研究》1979年11期）可是就是這樣溫和的批評，卻觸怒了石油部門領導集團和維護舊體制的領導人。他們通過上述報刊批駁《人民日報》，說這是否定了大慶的經驗，反對工業學大慶，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發展生產引導到追求個人生活上去」。還指桑罵槐地說，這是「社會上有極少數人利用群眾生活的困難，把矛頭指向中央。」

這些指責未能阻止討論。各地報刊和學術團體仍然繼續討論生產目的，持各種不同意見的文

章都得到發表。討論呈現出熱烈展開的勢頭。

胡績偉回憶說，對於其他報刊發表不同意見的文章，《人民日報》認為是好事。因為過去《人民日報》的言論從來被看做中央的意見，沒有人敢提出批評。這次石油部門報刊提出不同意見，表明這是一種進步。因此，他們還把這些文章印出送給中央領導人參考，準備繼續展開討論。他們沒有料到，這場由黨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親自組織發動，在黨報上較集中地進行的、理論結合實際的生產目的問題討論，竟受到干擾而中止。

導致《人民日報》停止討論的干擾主要來自上面。

當時擔任黨中央副秘書長的胡喬木反對這場討論。他沒能說服胡耀邦，就去找了當時的最高領導華國鋒主席，華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見。胡喬木就到鄧小平同志處，向鄧小平報告說，華主席和中央一些同志都反對生產目的的討論。胡喬木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後，又去告訴胡耀邦說，鄧小平同志、華主席和其他幾位中央同志都反對這一討論，「如此向胡耀邦施加壓力，耀邦只得通知報社，這一討論暫停一天。」這是當事人胡績偉在《報人生涯五年》一書第263頁所記載，與當時中宣部理論局的李洪林的書上寫的相同，我是相信的。因為我了解耀邦同志，他最是照顧全局的。

胡績偉認為生產目的問題需要討論。從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後，討論已經展開，突然停止，對貫徹八字方針不利。而且這樣來一個急剎車，會引起下面各種猜測。他為此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幾天後，胡耀邦約胡績偉談了一次話，大意是說，這次討論從發起到展開都是他負責指導報社做的，一切由他負責，希望報社照顧大局，照顧團結，也照顧他的困難，把這次討論停下來。還說希望我（胡績偉）服從中央的意見，等等（以上情況摘自胡績偉《報人生涯五年》第263-265頁）。這種情況下，報社當然只得停止這次討論了。

胡耀邦通知《人民日報》生產目的討論暫停一天，但是這一停就停了大約半年。有意思的是這個通知外地並不知道，所以一些地方還繼續座談、討論，地方報刊上也不時有文章發表。

（3）新形勢下醞釀全國性討論會

1980年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年2月29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黨中央總書記。人們不會忘記，上年的生產目的討論是他發動的。在新形勢下，北京經濟學界不失時機地重新展開了生產目的的討論。

1980年6月，《人民日報》又開始發表討論生產目的的文章。6月9日發表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董輔初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實現的幾個問題》一文；6月30日發表中央編譯局局長、馬列所兼職副所長王惠德的《有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幾個問題》一文。這個期間，首都各大報也陸續發表了一些討論生產目的的文章。

1980年8月，經濟學界就醞釀召開生產目的討論會。時任社科院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總幹事（該會改組後任會長）的于光遠，於8月19日晚，邀集馬列所幾位從事經濟研究的同志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的其他負責人開了個小會，我作為馬列所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副所長也參加了。于光遠正式提出由我們這兩個單位聯合發起，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生產目的討論會，講了他的一些想法。首先，要針對近年報刊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擬訂會議討論的題目，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能否成立？生產的目的是使用價值還是利潤？生產目的與產業結構的關係，生產目的與生產、消費和積累的關係，等

等。其次，要分題分組準備。除北京地區的同志外，還要委託幾個地方的同志分頭準備，寫出發言稿。為了準備充分些，大家要把各地方的報刊翻一翻。再次，要到幾個地方去看看，了解實際情況。最後提出要很快開個預備會，研究具體的籌備工作。26日下午，我們又議論了一次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問題。

從8月下旬起，討論會的準備活動加緊進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於9月1日召開了幹事會。副總幹事侯雨夫提出，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成立一年了，應舉行年會，建議年會與生產目的討論會合起來開。宋濤、吳敬璉、吳光輝、衛興華、江春澤、馬家駒、王永江等同志發言，初步討論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問題，積極準備參加這個重要的學術會議。

1980年9月10日上午，社會主義基本規律全國討論會籌備會正式成立。這次邀請參加的還有趙履寬、方生、蕭灼基、張朝尊等同志，外地學者湖南消費經濟學會的負責人尹世傑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推選了籌備會主任，研究了人員分工，對討論會的籌備工作做了比較細緻的研究。籌備會成立後，推動生產目的學術活動更廣泛地展開，這個時期，幾乎與經濟學有關的學術活動都會談到生產目的。如理論方法組、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編書組、雙周座談會以及一些地區的經濟學會。

根據8月10日會上的意見，由我組織進行到外省市作些實地調研，為生產目的討論會作準備。9月份我同代成去了上海、10月間同侯雨夫到遼寧瀋陽調研。這兩個地區的經濟學界和領導都熱情配合協助，我們了解和收集到不少重要情況和問題，對組織學術討論很有幫助。

準備工作在各地抓緊進行。北京地區召開了三次小型討論會，時間是11月3日、11月10日和11月17日。這些討論都做到了理論結合實際，百家爭鳴，為大會討論作了學術上的準備。

11月中旬，籌備會開會研究工作進展情況。基本上確定了會期從12月4日至10日，約一周，不超過15日。會議規模為300人。地點在市內北京軍區後勤部招待所，只有250個床位，本市同志可以不住會，基本上夠用了。建議成立大會秘書處，下設會務組、簡報組、秘書組，討論了人員的分工，並定於25日開預備會。決定用大會秘書處名義給各地打電話，要求速報參加者名單及提交論文等重要事宜。

籌備會同志不辭辛勞抓緊工作，保證了這次民間學術討論大會的成功召開。

三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全國性大會

1980年12月3日，籌備會邀請各地代表開了一次碰頭會，成立了包括于光遠、陳岱孫、龔士奇、王惠德、宋濤、張薰華（上海）、蘇紹智、馮蘭瑞、李光（甘肅）、朱川（遼寧）、孫尚清、巴音蒙合（內蒙）、謝文傑（青海）、志超（新疆）、于德新（吉林）、丁德俊（河南）、陳興（江西）、田方、朱劍農等九人的大會主席團。

主席團會議推選馮蘭瑞擔任大會秘書長，石磊、代成、侯雨夫和上海、廣東各一位擔任副秘書長；批准了大會日程、分組名單及各組召集人；同意籌備會關於秘書處下設各會務工作組人選的建議：彭克宏為會務組長，李成勳、王永江為簡報組長，陳德華為秘書組長；討論了大會的開法。

于光遠建議，為了把這次討論會開得活躍深入一點，可否改變一下會議的開法。除了照例的大小會外，增加由各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心小組討論會，晚上還可以自由組織沙龍。大家都說

這個意見很好。

1980年12月4日，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討論會在首都隆重開幕。首都和全國各地前來參加的達700多人，有很多人聞訊趕來，大會也熱情歡迎，因此大大超過原定300人的計劃。預定的會址後勤部招待所不夠住了，會務組又包了煤炭部第一、二招待所，每天用大轎車送代表到會場。

大會預先收到的論文114篇，印發給每位與會成員。還有隨身帶來的若干篇也陸續印發。《文匯報》記者周錦尉對大會秘書長馮蘭瑞進行訪談。訪談錄以「討論生產目的的現實意義何在？」為題載於該報12月5日，記者並將當天報紙送到大會人手一份。

這次會一共開了七天，10日結束。七天中開了五次大會，五次中心小組會，一次沙龍。中心小組開會時各小組開討論會。時間非常緊湊，討論非常輕鬆，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大小會上都有一些不同意見爭論，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會後也有個別同志認為交鋒不夠。

大會發言39人，中心小組發言59人次。小組討論很熱烈，12月7日晚馬家駒組織了一次沙龍。

這一周的會議開得熱烈活潑緊張深入，與會同志反映收穫很大。討論涉及生產目的的各個方面，內容豐富，這裏只能對討論的幾個主要觀點作一概括的介紹。

第一天大會于光遠首先發言，闡明大會的宗旨是要真正弄清楚生產目的，要深入下去，從理論上、實踐上深入下去。指出經濟學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要做點對實踐有幫助的工作。

關於大會的名稱和內容問題。有的同志說，通知是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來了才知道討論生產目的。這是怎麼回事？大會執行主席解釋說，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就是討論生產目的，基本經濟規律包含生產手段和目的，不過根據目前實際經濟工作的需要，側重討論生產目的，當然也要涉及手段。

關於如何從理論上加深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認識。于光遠在第一天大會上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的生產活動要符合社會主義的本性。甚麼是社會主義的本性？他在下午的中心小組會上進一步闡明了這個觀點。他說，甚麼是社會主義？如何評價社會主義？以前流行的是看生產增長的速度，也對。生產是個基礎。但光那樣看是不夠的。生產不能包括一切。要從人的角度、從人民群眾的利益這個角度、從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角度來看問題。這就是人本主義。過去把人道主義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從來是關心人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甚麼？是人的幸福。他針對當前的實際說，到本世紀末的奮鬥目標除達到人均一千美元外，是否可以加一點精神方面的目標？他說：「富裕並不等於幸福。」安娜為甚麼要自殺？不是經濟困難。我們的生產實踐要符合社會主義的本性——人本主義。

王惠德在大會發言說，我們搞社會主義為了甚麼？就是為人民過幸福生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裏面談「異化」問題，就提出這樣的思想：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完成別的甚麼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就是把人看成是完成甚麼任務的手段、工具，好象人只要不餓死，只要吃飽了就行，然後就去完成甚麼任務。這個「左」的指導思想一直這麼繼續下來，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

他們的這個觀點受到與會同志的重視，在大會和小組討論中紛紛發言。批判當時提倡的「先生產、後生活」、「先治坡、後治窩」，指出這些都是不把人看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都是違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表現。勞動總局的王榕說：甚麼「先生產、後生活」？不知是甚

麼人提出的！她氣憤地質問：不生活怎麼能生產？

關於生產目的討論對實踐的重要意義。大會著重討論了生產目的與新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關係。指出積累和消費比例關係嚴重失調有歷史的原因，但主要是由於近三年的「大躍進」。大量資金、物資投入基本建設，導致積累佔國民收入的比例過高，1978年達36%以上。這是「為生產而生產」的指導思想的後果之一。黨中央提出調整的方針是完全必要、正確的。但在貫徹中遇到相當大的阻力。據了解，當時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到省裏調研，通過省經委向省計委了解調整的進展情況，有的省計委竟回答說：「無可奉告。」對於引進二、三套設備，各省大都不贊成，主張「下馬」。但是有的部門說，就是下不了。

不少同志發言批評「左傾」路線或「左傾官僚主義」，「兩高兩低（高速度、高積累，低效率、低消費）」，片面強調艱苦奮鬥，不考慮人民生活困苦，更不談滿足社會需要，根本違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生產目的討論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調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去年《人民日報》討論雖然時間不長，對有的地方也產生了一些效果。如遼寧，1980年以來進行了一些初步調整：改變了基建投資方向，將約一半以上投入消費資料生產和文化生活方面；關停並轉了三百二十一個耗能多、虧損大、無銷路和污染嚴重的企業；輕工業增長速度首次快於重工業，等等。同志們用許多事實說明，中斷討論對實現調整、改革很不利。「為生產而生產」是調整的重大障礙。

關於生產目的討論是解決宏觀經濟問題還是微觀的問題？多數發言認為，主要是解決宏觀經濟的問題，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問題，整個國家或者是一個地區、一個省市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問題。如果宏觀指導思想發生問題，造成損失就是一大片，不容易糾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是全國性的問題。至於企業，如果生產目的發生問題，糾正起來比較容易。而且企業生產目的要比較複雜一些。當時正在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企業作為商品生產者，就有一個實現價值的問題。所以既要按價值規律辦事，還要有宏觀經濟思想和計劃的指導。

關於滿足需要包含哪些內容？這個問題，馬克思認為，人的消費需要包括生存資料、享受資料、發展資料。沒有生存資料，人不能生存，還談什麼生產？人不僅要生存、要發展，還要享受，物質的和精神的享受。人有了享受才能生活得好，才能發展。這就要有滿足各種需要的資料，使人能夠發展。人人都能得到發展，社會才能不斷發展、進步。為保證人民消費需要，勞動總局的莊靜提出，國家經濟發展計劃中應包括生活消費計劃的意見。

關於1979年財政出現赤字問題。大會發言中，不同意有的人將1979年財政出現赤字、物價上漲等問題歸咎於一屆三中全會。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楊培新說，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目前基本建設戰線過長，財政赤字，通貨膨脹，正是「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大幹快上」的產物。中心小組會上，于光遠表示堅決不同意把這兩年經濟上出現的問題算在三中全會的賬上。

關於生產目的和政治體制改革。馬列所副所長蘇紹智發言，主要講了生產目的和民主化問題，介紹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他說：「民主化是保證生產目的實現的重大措施，民主化是消除政治、經濟專制的一劑良藥。」

大小會議討論中涉及的問題還有許多，如基本經濟規律中的「手段」問題、流通問題、實現基本經濟規律的機制問題、人口和就業問題。上海、廣東、黑龍江、吉林、新疆等省的同志用本省的實踐論證了生產目的的重要性，有的發言討論了有關的理論方法問題。馬家駒

在唯一的一次沙龍上作主要發言，談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就講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二重性，不同意有的同志說企業生產的目的就是價值，等等。

以上是這次全國性討論會上討論的主要觀點。大小會、中心小組會發言有百餘人次，討論的內容非常豐富，還有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這些，均不可能在此一一列舉。好在這次討論會有全套會議資料（包括簡報）；在1981年《中國百科年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有扼要介紹；還出版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論文集（大會秘書長選編並寫前言），收入重要文章九篇，九萬六千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很快於1981年3月份趕印出。以上資料均可查閱、參考。

四 關於生產目的討論的三點說明

拜讀了2002年《炎黃春秋》第5期吳江的《我親歷經濟理論上的一段撥亂反正》（以下簡稱「親歷」），引起我對二年前進行生產目的討論那次學術活動的許多回憶，並發現「親歷」中有些主要內容與事實不符。作為那次活動的當事人，我認為應該把真實的歷史記錄下來，避免以訛傳訛，讓後來者無法識別真偽。這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應盡的責任。

「親歷」一文中說，1979年這場生產目的「討論的發起緣於黨校的學員對於一個問題的爭論：我們的經濟工作是否存在著『為生產而生產』的問題？對此有兩種不同的意見」。「當時中央黨校內部一個理論小刊物《理論動態》就此問題寫了一篇評論，執筆者吳振坤同志評論支持第二種意見，發給學員參考。沒有想到，這篇評論除回應學員的討論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民日報》於10月20日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全文轉載了這篇評論。」「11月22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經濟學家于光遠就此所寫的評論。」這段敘述，除了黨校學員中的爭論和吳振坤執筆發表於《理論動態》的文章，屬於黨校內部的事，我不清楚之外，其他情節都是與史實不符的。

（1）關於1979年生產目的討論的緣起

前面已經有大量資料說明，生產目的討論自1978年下半年就已在報刊上開始，到1979年全國報刊已發表一百多篇文章。吳江在他的「親歷」中說，這場生產目的討論起緣於中央黨校學員的爭論和《理論動態》的一篇文章。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吳江不是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學術活動的情況不清楚不足為怪。但是既然要談經濟學活動的歷史，就應查看一下當年的報刊，或對當年的參與者作點調查。像這樣只抓住發生在身邊的一點情況，就對全國經濟學界廣泛的學術活動作出判斷，並作為歷史來記述，在思想方法是「以偏概全」、不實事求是，治學態度則是不嚴肅的。

（2）關於《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產生

黨校內部的情況我不清楚，這篇評論的寫作，不能排除「親歷」提供的有關回應學員爭論這一情節。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一文最初的執筆者是吳振坤，這是我看了「親歷」才知道的。

關於《人民日報》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的寫作過程，還有一些更直接更重要的情況，過去我們只是聽說，未知其詳。最近讀了當年報社負責人胡績偉在《報人生涯五十年》一書中的回

憶，才完全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原來《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主要是根據胡耀邦在《理論宣傳動態》（以下簡稱《動態》）第113期上的批示寫的。1979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悅和《人民日報》的蔣映光合作寫了一篇文章：斯大林對雅羅申科為生產而生產觀點的批評，刊於該報內參《動態》第113期。文中提出在我國經濟調整中應當重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注重消費品生產，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胡績偉把這期《動態》送給胡耀邦，胡耀邦在這期《動態》上作了幾處眉批，還另寫了一個批語，轉給了中央黨校。批語說：

這裏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可惜沒有根據我們經濟戰線上同志們的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進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針對性和戰鬥性。請你們根據這篇東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討論幾次，寫出一篇東西來。希望四中全會前能完成。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

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根據胡耀邦的指示寫出了「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一文，先在黨校的《理論動態》上發表，廣泛徵求意見加以修正後，才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人民日報》1979年10月20日發表⁵。胡績偉的這段回憶是可信的，他是當事人。胡耀邦的批示若不是親眼看到，是回憶不出來的，這段回憶只有一處日期上的錯誤：本報特約評論文章發表於10月20日，錯為2月20日。這裏我根據手邊資料改了。現在再來看這篇評論的內容，也能看出它與《動態》113期文章的關係。

事實上，《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這篇重頭文章的寫作是在胡耀親自指導下進行的。1979年10月這場比較集中的生產目的討論，也是胡耀邦親自布置指導的。胡績偉回憶說：胡耀邦同志針對多年來工業建設中的嚴重偏向，抓住「我們生產的目的是甚麼」的核心問題，策劃和組織了文章，指導《人民日報》帶頭開展了一場「生產目的」的討論。在討論受到干擾，胡耀邦受到壓力，通知胡績偉報上暫停討論時，胡績偉思想不通，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為此，胡耀邦約胡績偉談話，說服他服從決定。胡績偉「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他（胡耀邦）很激動，一下站起來，對我大聲說，發動由他負責，停止也由他負責。只希望我服從中央的意見，把這次討論堅決停下來。」胡績偉才不再堅持了。⁶遺憾的是，吳江在「親歷」一文中根本沒有提到胡耀邦的作用，也沒有提到《理論宣傳動態》113期。

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在「親歷」中，吳江還把《人民日報》發表這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說成是「轉載」，同時又將轉載于光遠一個月前發表於《財貿戰線》的文章說成「刊登」。這些作法，不仔細琢磨還不明白其中用意！原來，「轉載」和「刊登」的用法也是有學問的。

事情是這樣：《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的第三天，10月22日轉載了于光遠9月11日發表於《財貿戰線》的文章。吳江卻寫為「刊出了經濟學家于光遠就此（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所寫的評論」。但是于光遠這篇文章發表在先，《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的發表於後。于光遠怎麼能夠對尚未發表的評論發表評論呢？如果寫明「轉載」不就露餡兒了嗎？現在寫成「刊出」，讓讀者相信于光遠是在看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後趕寫了這篇評論。「親歷」作者如此用心「良苦」，是為了甚麼呢？

（3）關於1980年報刊討論和12月的全國性討論會

「親歷」寫道：「1980年初，來中央黨校學習的各地黨政領導幹部也要求澄清這個問題（指

生產目的的討論和中斷），尤其要從理論上搞清楚這個問題。作為分管學校教學的負責人，我不得不作一次講話，從理論上並聯繫實際說明這個問題。3月份講話，4月份整理成個書面東西，分發給學員並送黨校領導人，但只作為個人意見提出。這篇文章就以「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再研究」為題，在1980年《紅旗》第12期（6月16日）上刊出了。」在介紹了這篇文章的內容之後，吳江接著寫道：「這篇文章的公開發表，引起了中央報刊關於生產目的的第二輪討論。1980年12月4日至10日還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性的討論會。」看了這段敘述，不禁使我啞然失笑：「原來如此啊！」

但是，事實果真是這樣嗎？1980年生產目的問題在報刊上的討論是吳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嗎？

關於1980年這段生產目的討論的歷史，我可以負責地說，與吳江發表於《紅旗》雜誌的文章毫無關係。大會籌備組根本沒有看「紅旗」上吳江的文章。

1979年底胡耀邦通知《人民日報》暫停討論，但沒有通知外地。所以1980年全國各地報刊仍在繼續討論，還有一些地區召開小型討論會，如遼寧、上海。這些都不是《紅旗》上吳江的文章引起的。《人民日報》1980年6月9日和30日相繼發表了董輔初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實現的幾個問題」和王惠德的「有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幾個問題」等重要文章。這些文章的寫作和發表也不是吳江發表在《紅旗》第12期（6月16日出版）的文章引起的。董輔初的文章發表於6月9日，時間在吳江文章發表之前，王惠德的文章發表於6月30日，也不是在吳江文章發表之後才寫的。吳江根據甚麼說別人的文章是自己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呢？

「親歷」寫道，吳江「這篇文章公開發表，引起了中央報刊關於生產目的第二輪討論。1980年12月4日至10日，還在北京舉行了全國討論會。」如果我沒有理解錯，這就是說，1980年12月4日至10日舉行的生產目的全國性討論會也是吳江的這篇文章公開發表所引起的。但是，這個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關於生產目的全國性討論會的情況和過程，前面已詳細介紹。老實說，失敬得很，我們在醞釀、籌辦這次全國性討論會時，沒有拜讀吳江發表在《紅旗》上的文章。這次大會的召開與吳江文章及吳江本人毫無關係。黨校參加會的是吳振坤等幾位經濟理論工作者。

《炎黃春秋》2002年5期上吳江的「親歷」，實在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

近些年文壇有一股歪風，有些人寫回憶錄、出書，自我吹噓，或者借某位領導人、某件大事來抬高自己，為達此目的而不顧事實甚至編造歷史，這都是很不嚴肅不科學的。回憶錄、親歷記，是寫歷史，應求真求實。尤其是涉及一些歷史上重要事件的回憶，更要嚴格地做到實事求是，不要誇大也不縮小。有的事情年深日久，記不清的，也應注明。否則就會以訛傳訛，後人對這段歷史的真面目就很難弄清楚了。

吳江近些年寫過一些類似的回憶文章、出過書。別的不說，只說那兩篇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的文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來龍去脈」、「中國社會主義目前所處歷史階段的爭論」⁷也有同樣不實事求是的毛病。對此問題，筆者曾在2001年12月15日北京開達經濟學家諮詢中心舉辦的「于光遠學術思想研討會暨于光遠參加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發言評論，發言稿收入內部文稿《中國市場經濟論壇 專刊》，以後公開發表於《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年6月號。對於吳江的這種「治史」態度，筆者是不敢恭維的。

註釋

- 1 胡績偉：《報人生涯五 年》（2003），頁260。
- 2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一九四九 - 一九八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277。
- 3 引自張春橋組織編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按語，見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和3月1日出版的《紅旗》第3期。
- 4 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頁48。
- 5 同註1，頁261。
- 6 同註1，頁260，265。
- 7 參見吳江：《社會主義的前途和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馮蘭瑞 經濟學家，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二 二期 2004年1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二 二期（2004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